

Hello, The Independent Bookstore
独立书店，你好！

中国旧书局

姚一鸣 / 著

百年书林风雨，百年书局沉浮，一个
断章，一段历史，一份回忆……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中國旧書局

姚一鸣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旧书局/姚一鸣著.—北京：金城出版社，2014.6

ISBN 978-7-5155-1050-7

I. ①中… II. ①姚… III. ①图书出版—文化史—上海市—清后期～民国
IV. ①G239. 29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69187号

Copyright © 2014 GOLD WALL PRESS, CHINA

本作品一切中文权利归 **金城出版社** 所有，未经合法许可，严禁任何方式使用。

中国旧书局

作 者 姚一鸣

责任编辑 雷燕青

开 本 635毫米×965毫米 1/16

印 张 15.5

字 数 190千字

版 次 2014年6月第1版 2014年6月第1次印刷

印 刷 北京振兴华印刷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7-5155-1050-7

定 价 39.80元

出版发行 **金城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广泽路2号院（东区）14号楼 邮编：100102

发 行 部 (010) 84254364

编 辑 部 (010) 84250838

总 编 室 (010) 64228516

网 址 <http://www.jccb.com.cn>

电子邮箱 jinchengchuban@163.com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010) 64970501

序

我是一个爱书之人，虽然淘书的时间也不算长，沉浸于其中也感受到了一种乐趣。平时特别爱看书话一类的书籍，体悟着前辈们的爱书热情，他们或从书店或从旧书摊上，总能淘到一些有意思旧书，写成文字和大家分享。在阅读的过程中，我发现除了一些常见的书话作品以外，在不少的老期刊中也会有一些相关的文章，其内容并不比书话差。更为重要的是这些看似有些随性的文字，无意中留下了珍贵的书林史料。

在这些书话作品中，如陈乃乾的《上海书林梦忆录》、黄裳的《上海的旧书铺》、阿英的《城隍庙的书市》和《西门访书记》、郑振铎的《求书日录》、高震川的《上海书肆回忆录》等，都是有关上海书业的名篇。近年来也出版了不少有关上海书林的书籍，如《百年书业》（上海书店出版社）、《旧时书坊》（三联书店）、《中国旧书业百年》（科学出版社）等书，都对上海的书业有所介绍，且文章和作品中多为作者的亲历，对于了解上海过去的书业都是大有帮助的。另如《上海出版史》（上海社科出版社）、《上海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中国近现代出版史料》（上海书店出版社影印）等大型丛书中，亦会有一些有关上海书业的篇章，但所占比例不多。

阅读中也渐渐发现，并没有一本专著对上海书业情况有个全面的

描述，1993年上海学林出版社曾出版过一本《近现代上海出版业印象记》，由朱联保编写。作者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比较完整地介绍了近现代上海出版业。但写作此书时作者已年过花甲，全凭着记忆来描述，相关史料的运用较少，且有些篇章多有错讹。于是我设想，能否写一本上海书林全景式的文稿。这个写作的计划便在心中渐渐地滋生，我开始有目的有步骤地看一些相关的书籍资料，渐渐地文稿的雏形便在构思中有了眉目。

虽然平时我也写一些淘书的札记，及旧书赏读的文章，且多有发表；之前也写过几本文稿，但要真正地写起来，还是有不少困难的。首先是文稿的所涉内容范围，以怎样的一种方式来反映和描述上海的书业，其实从题目“中国旧书局”便可知是断章式的描述，而非全史式的，本拟的题目是“上海书业百年”，但后一想，这样为书业作史，不仅难度更大，且力所不能及；其次是文稿的体例，是集中写还是分段写，又以怎样的一种写作形式来表达，因为近现代上海的书业规模不小，各种各样的书局、书店和书庄多如繁星，选择的标准即是在文化人和爱书人笔下留着深刻印象的，这样就可以确定适合写作的进程；其三是语言风格，尽量用平实的语言来描写和表达，尽量写得生动有趣，这也是写作的目标。

在最后的写作之中，定下来的体例即是以书局的历史来折射上海的书业，首先定下的年限为从晚清到1949年为止，即使如此，涉及到的书局也有几百家，只能从中加以选择，所依据的是《上海出版史》（上海社科出版社）上的范畴。选择和筛选的过程，实际上也是一个写作体例完善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学习和认知的过程，尽管以前也喜欢看书话类作品，但远没有到精读的程度，这样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精读了不少和上海书业相关的文章及书籍，慢慢地全书的构思逐步完成。

开始尝试写了大约有一万余字，其中即碰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

旧时的书局均涉及出版，大多为前店面后出版，这可能也是近代出版业的特点。而文稿所叙的主要内容是以图书的销售为主的，中间也可以穿插不少和淘书相关的故事。为此写作的范围无形中又扩大了。但细一想，书林的范畴其实也是包括出版的，从另一方面而言，上海书林的发展是和出版息息相关的。只是在写作内容的比重上，应该有所侧重。基于这样的一种写作思路，使文稿能继续下去。

一直以来我都认为写作的过程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怎样使文稿写得通俗一些，写得有趣一些，是我在写作的过程中所一直追求的。在具体的写作中，我把所涉及的五十几个大大小小的书局分为了古书、古旧书、新书、杂志等几个类别，而其中古书、古旧书以销售为主业，但也自己影印和出版图书，新书主要都是以出版为主业，销售为副业的，如民国时期的几大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大东书局、开明书店、良友图书公司、北新书局等，这些民间出版机构都拥有极丰富的出版物，为繁荣近现代的出版业，都做出了极大的贡献。杂志代理公司不仅代销各类杂志，并且自己也编辑出版杂志。这种种的特点构成了上海书林独特的风景线。

其实上海书林的发展，和上海整个城市的发展，和上海文化的发展是息息相关的。从鸦片战争后上海的开埠，外来文化深深影响了上海城市发展，上海实际上也成了近代文化的聚集地，从纷至沓来的西洋人，到南来北往的全国各地人等，构成了海派文化中海纳百川的地域性特点。具体表现在上海的书林中也是如此，从最早的洋人所办书店和出版机构，到以商务印书馆为龙头的民间出版业的兴起，在西学东渐的浪潮之下，从中国传统的国学典籍，到西学著述的西方先进科学文化的输入，带动书林向前发展的同时，也促进了中国近代文化的向前发展。

此书只是在资料辑佚的基础之上，努力地去展现在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过程之中，上海书林所透现出的文化底蕴。通过对近百年来上

海书林的断片式描述，从一家家书局的沉浮及淘书者的珍贵回忆，努力地去勾勒出上海的书香氛围。并且在这种书香氛围之中，去感受近代书香文化的脉络，从鲁迅、陈乃乾、黄裳、郑振铎、高震川、叶圣陶、黄永年、阿英、唐弢、叶灵凤、曹聚仁、周作人、纪果庵、朱遂翔、周越然、马栋臣等人的回忆文字中，着力去展现近百年书林的风风雨雨。

或许，这也是写作此书的目的所在。

是为序。

2013年中秋前于灯下

Contents 目录

001 引	068 富晋书社
008 扫叶山房	072 抱经堂
013 大同译书局	077 忠厚书庄
017 土山湾慈母堂印书局	081 传薪书店
021 申昌书局	086 博古斋书肆
026 广学会书店	090 来薰阁
030 格致书室	095 萃古斋
034 文瑞楼	099 受古书店
038 艺苑真赏社	103 文明书局
041 会文堂书局	108 商务印书馆
044 广益书局	113 附文:《我与商务》(周越然)
047 古书流通处	118 中华书局
053 修文堂	123 大东书局
058 来青阁	127 开明书店
063 中国书店	133 世界书局

139	现代书局	187	正中书局
143	附文 :《从一张照片唤起的 记忆》(纪弦)	190	儿童书局
146	亚东图书馆	199	水沫书店
151	北新书局	203	大江书铺
155	附文 :《在北新书局作练习 生》(萧乾)	206	小说林社
158	上海良友图书公司	214	时代书店
163	神州国光社	218	美的书店
166	内山书店	222	中央书店
171	新月书店	225	天马书店
175	光华书局	228	亚光與地学社
180	上海杂志公司	232	生活书店
184	附文 :《小小计划初步成功》 (张静庐)	238	跋

作为近代有名的现代大都市，上海从其开埠之初始，就成为引人注目的焦点。这一方面是上海独有的地理位置所决定的，它东临大海，有着迅捷便利的交通优势；另一方面自鸦片战争后上海成为通商口岸，也成为万商云集之地，不少西方人到上海来传教、经商、办学堂、办学校、办报刊、办实业等，西方的列强们带来侵略和殖民的同时，也催生了上海近代化的进程。

自晚清到民国，上海逐渐成为全国经济文化的中心，也是近代中国的出版中心。从晚清开始，中国几个重要的翻译出版西书的机构，如墨海书馆、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广学会、格致汇编社、益智书会、商务印书馆、译书公会等，出版和翻译了大量的西书，如伟烈亚力和李善兰译《几何原本》、艾约瑟和李善兰所译《重学》、李提摩太和蔡尔康所译的《泰西新史揽要》、上海译书局《民约通义》、江南制造局翻译馆《西国近事汇编》等，这些西学的书籍为晚清社会带来了难得的科学和文化。

上海最早的书业，在辛亥革命以前，主要都集中在棋盘街一带，即江西中路至河南中路的福州路东段；还有麦家圈，即福州路山东路附近；还有广东路中段的宝善街，以及汉口路一带，这是晚清上海书业比较集中的一个地区，云集了那个时代几乎所有上海地区的书业，

构成了特有的文化氛围。沿河南中路、江西中路、山东路、广东路、汉口路、交通路等一带，实际上成为上海书林的缩影。那时有名的书店有扫叶山房、尚古山房、千顷堂、会文堂、仓海山房、宝善书局等，原大都在上海县城内的老城区，后陆续都搬迁至棋盘街一带，逐渐成市。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上海的县城北面郊区被辟为了租界，西方侵略者的扩充和蚕食，使租界的面积逐步向西面郊区延伸。随着西方侵略者用枪炮打开中国的大门，作为通商口岸的上海，开始涌入不少的西方传教士，他们设立教堂，开办学校，办报刊，办销售出版机构，办实业。在传授西方宗教的同时，带来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在早期中国的新闻出版业中，如广学会、土山湾、墨海书馆、格致书室、申报馆、申昌书局等，到文明书局、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出版机构的出现，形成了上海书林真正的繁荣。

上海最早的书店，是在清朝中叶的黄文正书店，地址在上海县城的大东门外。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墨海书馆创办，其后又有美华书馆、土山湾慈母印书馆、格致书室、同文书会等相继创立，除了出版宗教书籍以外，也自办发行销售。清咸丰年间，上海也出现了以销售古书为主的旧书店，大多集中在上海县城南市四牌楼一带，并渐成规模。清同治年间，上海县城旧书店的规模进一步扩大，有尚义堂、醉六堂、绿荫堂等书坊。清同治十一年（1872），英商美查创办了《申报》，后又在清光绪二年（1878）开办了点石斋书局、申昌书局，成为晚清上海最大的出版机构。就在同一个时期，苏州席氏扫叶山房在上海设立分公司，专门从事印售木版和石印书籍，成为那个时期沪上最大的古旧书店。其后又出现了文瑞楼、同文书局、鸿文书局、千顷堂书局等古旧书店，兼营出版及自印自销，在晚清上海具有一定的规模。

清宣统三年（1911），陈立炎在上海设立古书流通处，揭开了上

海旧书业繁荣的序幕。至此，来自苏州、杭州、扬州等地的江南书贾纷纷到上海开店，其中有抱经堂、来青阁、汉学书店、传薪书店等，他们以销售古书为主，形成了一定的书业市场；亦有来自北方人所开的旧书店，如来薰阁、忠厚书庄、富晋书庄、修文堂、萃古斋等，他们和南方人所开的书店形成竞争之势。这些古书旧书店的业主，大多具有相当的目录版本、文物考古、装裱字画等方面的知识，他们坐店，上门收购旧书，还派人到全国各地收购民间旧书，并加工整理，编辑目录，影印善本，极好地传承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夏瑞芳等于上海创立了商务印书馆，它的创立标志着中国现代出版业的开始。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商务印书馆成立了编译所，开展以出版为中心的多种经营，使商务印书馆实力迅速壮大，编写大学、中学、小学等各类学校教科书，出版和销售各类书籍，使之成为民国期间最大的出版、发行、销售机构。商务印书馆成立之后，1912年陆费逵又成立了中华书局，1916年大东书局创立，1917年又成立了世界书局，1926年章锡琛又办了开明书店，另外有影响的书局还有大江书铺、新月书店、亚东图书馆、生活书店、上海杂志社、正中书局、上海书店、创造社发行部、良友图书公司、新亚书店、北新书局、群益书店、作家书屋、新文化服务社、内山书店、晨光出版公司、文化生活出版社等，形成了民国时期上海书林的繁荣景象。

以商务印书馆为龙头的民间出版、发行、销售机构的大量涌现，有力地促进了民国出版文化的发展。由于民国时期的出版机构，大多集编写、出版、发行、销售于一体，更好地加快了图书发行业的成长。从民国初期开始，到上世纪四十年代末，上海的各类书刊发行企业将近二百余，它们以上海的福州路为中心，形成了上海书业的又一个繁荣时期。虽然在抗战期间和上海沦为孤岛的时间里，上海的书业也遭受过重创，但不少文化人为之前仆后继，延续了沪上书林的薪火。

民国时期民间出版机构大量涌现，出版的图书品种和数量也大大地增加，也带来了图书发行和销售的发达。河南中路的平望街书店林立，形成了极好的销售氛围。福州路山东路一带也成了有名的文化街。而国际饭店北面的牯岭路（现在的黄河路）一带，也集中了尚古山房、鸿文书局、沈鹤记等七八家小书店，另有几家印刷厂和装订作坊，被称之为小文化街。来青阁、富晋书庄等古书旧书店在汉口路，还有旧书店分布在卡德路（今北京路石门路）、辣斐德路（今复兴路）、常熟路、华山路一带。在上海老城厢的南市一带，也有不少旧书店和旧书摊。

在上海书林中，也有一些专业的特色书店，如清光绪十一年（1887）由传教士傅兰雅创办的格致书室，专营科技图书和文具用品仪器等。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又成立了科学仪器馆，专营自制的理化仪器、西学译刊、科学图书等。清光绪三十年（1904）西泠印社又在上海创立，门市专售金石、考古、美术图书，也兼售字画和印章。1912年有正书局也在上海开业，专售佛教一类的图书。1935年张静庐的上海杂志公司开业，销售全国各地出版的各类期刊。这些专业书店在上海书林中的比重并不算大，但丰富和充实了上海书业的层次。

上海书林中除了专业特色书店外，还有一些外文类的书店，如清咸丰十年（1860），英国人伊文思创办了伊文思图书公司，主要经营外文类图书。清同治九年（1870），英商开设的别发书店，专营西文书籍的印刷出版，在书林中小有名气。1897年商务印书馆也设有专售西文书的西文部，中国书商开设的西文书店还有：大华杂志社、中外书局、中国科学书社、东亚书局等，还有日本人所办的内山书店、金星堂、至诚堂，德国人所办的璧恒公司、派立贡书店等。1932年严幼芝创办龙门书局，专以销售中西文具，翻印原版西书。这些外文类的书店，体现了上海书林的多样性及中西文化的融合。

上海书林在图书的销售上，除通过开店的形式为主以外，还通过邮购、预订销售、流动供应、展销等销售形式，以此来满足不同层

次读者的需求。其中邮购和预订销售最为盛行，旧时的不少书店书坊，都会编印图书目录，以此来推销图书。而通过邮购的形式早在清光绪十一年（1887）即有著易堂书局最早以邮购来发售图书，之后格致书室也用此方法来销售图书。而其中商务印书馆以邮购作为主要销售渠道，不仅专设了邮购处，而且在上世纪二十年代中期每天都能有三四百单的邮购业务，并且利用和一些银行的合作、免收邮购费用等，加大了邮购业务在商务印书馆销售中的比重。其后如中华书局、生活书店等也都以邮购来拓展渠道。

邮购业务的盛行也出现在古旧书业之中，和一般的新书局不同，古旧书店大多缺少自己的出版物，虽然也影印和标点一些善本，但大多数的古旧书店都是以贩售书作为手段的，所以邮购也是特别的用心。在徐雁编著的《中国旧书业百年》中有专门的章节，介绍了各书局编印的各类书目，从而可见古旧书店在邮购旧书上的用心。周振鹤的《晚清营业书目》，也罗列了古旧书店邮购旧书的销售手段。这种以邮购方式增加图书销售的方法，在之后的书业中一直沿用着。

另一种图书销售的形式为预订销售。英商点石斋书局最早采用招股集印图书，出版《古今图书集成》，书价 600 银两，规定集 1500 股，以四分之一价优惠，每股规银 150 银两，读者在三年内分三次付清股款。清光绪十三年（1889），董英馆书局招股发售《大清一统志》，书价 56 银两，以 1000 股为额，对折优惠，每股 28 银两，分 8 银两、20 银两两次付清。（银两指膏火银，合 0.72 银子，相当于现 100 元人民币。）清宣统三年（1911），点石斋书局开办预订《点石斋画报大全》，书价 44 银圆，对折优惠，读者先预付洋 10 银圆购取预约券，半年后再付 12 银圆。（1 银圆相当于现 50 元人民币。）1918 年 8 月，群益书社《新青年》一至五卷再版，书价 5 元，实行预约，预付洋 4 元。1926 年 10 月，商务印书馆预约郑振铎编《文学大纲》精装四册，定价纸面 8 元，布面 10 元，预约价分别为 4.8 元、6 元。（元指银圆或

国币,1元相当于现30元人民币。)三十年代,中华书局《中华大辞典》《实用大辞典》《中华汉英大辞典》等十种图书加印普及本,发售预约,售价仅为原价的三分之一,预订三种以上再打九五折,预订六种以上再打九折。(材料引用自《上海通史》)

书业的繁荣或凋零,折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盛衰变幻。上海的书业历史悠久,在古代上海,街坊间就有图书销售的书肆。宋元时期,时属江浙的松江、金山地区官府、私家和书坊都有刻本流传。明清时期,刻本问世者甚众。维新运动后,新学书籍的需求量大增,木刻业无法适应,铅石印迅速发展。清光绪三十年(1905)上海书业公所和上海书业商会成立,标志上海现代书业真正形成。那个时代的各类书店迅速发展到两百家,出版的图书品种和数量大大增加,书刊发行业日趋发达。河南中路的棋盘街和福州路一带书店林立,被誉为“文化街”。至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书业进入繁盛时期。

上海的书业形式多样,特别在民国时期,就有的编、印、发三位一体,有的出版兼发行,有的专营发行。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大东书局、世界书局、开明书店等在民国时期的影响最大。1897年成立于上海的商务印书馆是中国历史最悠久的现代出版机构,创造了中国出版业的诸多第一。陆费逵于1912年在上海创立的中华书局,是最能代表中国古籍、学术著作出版水准的专业出版社,拥有传统学术和古籍整理的雄厚人才资源,《二十四史》等是该书局的代表书籍。由吕子泉、王幼堂、王均卿等于1916年在上海创办的大东书局,除主要出版中小学教科书、法律、国学、中医、文艺、社会科学丛书和儿童读物外,还出版了一批如郭沫若的《甲骨文字研究》《殷州青铜器铭文研究》等具有学术、史料和文献价值的图书,该书局还承印国民政府钞票、印花税票等。由沈知方于1917年在上海创办的世界书局,先是以出版小说为主,后编辑出版中小学教科书,在教科书出版业中与商务、中华形成三足鼎立之势。

上海书业虽然不比北京、南京、苏州和浙东地区历史久远，但却能后来居上以致成为中国近代书业的中心，有着其独特的原因。就政治环境而言，在战乱的情况下，由于外国租界的存在，使上海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避风港和聚居地。前清的遗老遗少、激进的革命人士、学者教授、书家藏家，一时风云际会，聚集一隅，造就了一个极其庞大的图书需求市场。就经济而言，晚清以后，上海凭借独特的地理位置，开放的人文政策，迅速成为远东地区的金融与商业中心。繁荣的经济催生了书业的迅速发展。据《近现代上海出版业印象记》一书统计，民国时期，上海大大小小的出版机构多达五百余家，出版的书刊总量占据了中国的大半壁江山。就地理环境而言，毗邻上海的苏州、浙东均是书业发达地区。民国时期，两地有许多旧家的藏书散向上海，如苏州的玉海棠、群璧楼，南浔的嘉业堂、适园，宁波的天一阁、醉经阁等，有力助推了上海书业的发展。

扫叶山房

扫叶山房是沪上书林早期销售和出版古书的代表书局。扫叶山房的创立最早可溯至明万历年间，由苏州洞庭山席氏创建，先设店于苏州阊门内，是吴门之地最大的古籍收藏和刻印、销售的书局。在清同治年间（1862—1870）进驻上海，共开有两家店，分别是同治年间设立在上海县城彩衣街的南号分店，清光绪六年（1880）设立在上海棋盘街的北号总店。

扫叶山房是明清之际江苏常熟席氏所建刻书坊，清代最著名的以出版古籍为主的民间出版销售机构之一，也是席氏用作坊刻图书的字号名，扫叶山房的店号引用了古人的“校书如扫落叶，随扫随落”之意。席氏刻书始于明万历时，扫叶山房的店主人席氏，先世居住于苏州洞庭东山，在明末清初之时，购得常熟毛氏汲古阁书版而特设扫叶山房。其后又将汲古阁书版翻刻流传，极好地传承了中国古代典籍的有序流传。

扫叶山房刻书最初见于明朝，时雕版印刷流行，有《十三经》《十七史》等多种古籍刊行于世，又辑录了唐人诗百家付梓印行，所刻书的版心均有“扫叶山房”字样。席氏扫叶山房曾新刻《全唐诗》，在康熙帝南巡时被官员奉献于皇上，引为佳话。扫叶山房共有五个分号，洞庭山席氏于苏州阊门、松江开设书坊，后又在苏州、上海设分号，